

唐代边塞诗研究

马兰州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边塞诗研究/马兰州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504—900—9

I. 唐... II. 马...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094 号

唐代边塞诗研究

马兰州/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504—900—9

定 价:15.00 元

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代序）

胡大浚

边塞诗讨论中的意见分歧，虽有研究方法的原因，有对复杂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因为对边塞诗缺乏比较明确、一致的认识造成的。究竟什么是“边塞诗”？大家取得接近、一致的看法，应是讨论研究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不容易的，但对它的内容给以较明确的范围，还是应该做、可以做到的。否则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以偏概全，意见很难接近。然而，多年来问题没有解决，则既有边塞诗自身的复杂性，也有“不确定性”方面的原因。

从“史”的角度说，边塞诗产生于隋季唐初，极盛于开元、天宝年间，流响于唐之中晚叶，这看来是很多研究者所同意的看法，因此说边塞诗有一个“史”的规定性，也因此，习惯上人们并不把先唐时期涉及民族矛盾、边疆战争、塞外风物之类的诗篇看作边塞诗，对唐以后自宋及清写这类内容的作品，一般也不作为边塞诗看待。所以可以说，边塞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现象。然而先唐时期和唐以后的不少诗篇，无论内容、形式、格调，与唐代边塞诗十分接近，何以不称边塞诗呢？（对于唐诗研究者说来，这种例子随便可以举出，这里不罗列了。）可见这里说的“边塞诗”，只是从史的发展的宏观角度所建立的一种认识，不说其他时代有边塞诗，是注重总体而忽略个别或部分，也是一种“约定俗成”。这是边塞诗不确定性的一方面。这个问题，本文第二部分还将涉及。

从诗歌内容说，有唐一代哪些作品可以算边塞诗？不难看

出，人们对它的理解颇为不同。由于没有人明确给它下过定义，这里只能从讨论中诸多文章立论的角度，加以概括来说明问题。

边塞诗是写边疆战争的。边塞诗是写民族矛盾斗争的。诗人在边塞所写的诗是边塞诗。作为一种，以上说法，似乎都是确定无疑的。但唐代边疆战争牵动了全社会，涉及问题多而又多，反映民族斗争的诗并不一定是边塞诗，边塞诗也未必一定写在边塞，其中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边塞诗”之称，本来只是研究者就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从一个侧面，取一个角度，进行认识的结果。由于它从内容到形式的丰富复杂，创作动机的各自不同，有写实的，有虚拟的，有直叙战争的，有纯粹抒怀的，有写景的，有咏物的，有咏史的，也有饯别的、赠答的，以及呈献奉和之作。假若我们取另一角度、另一侧面去认识，则何尝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如称其中一些作品为山水景物诗，一些是咏物诗、咏史诗、应制诗、赠答诗、闺怨诗，等等。可知，边塞诗与其他性质的诗歌，多有交叉；则其涵义自有相对性，不确定性。然而，研究边塞诗，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来认识，自应有其“质”的规定性，需要我们去探寻、把握，与此同时，由于其内容的复杂性、多方面性，也应对它建立一种多层次的认识，不可过于简单片面，执一而论。我们的意见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的。

边塞诗的产生，诚然和唐帝国与四境国家政权的矛盾斗争息息相关，边塞诗的重要内容之一诚然是反映唐王朝所进行的边疆战争之成败得失，边塞诗中往往突出地表达唐王朝国内各族人民，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兵民众热爱自己国家、民族的精神；优秀的边塞诗作，也往往是诗人身历边塞有感而发。基于此，有的文章立论时只着眼于边疆战争的问题，往往以诗人对待战争态度之是非论定边塞诗的价值，事实上把边塞诗仅仅看作写边疆战争的诗。而有的文章从唐代“中”“外”的矛盾、民族间的斗争

出发，又往往以是否表现爱国精神、民族感情论定边塞诗之得失，把边塞诗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划了等号。也有注意到边塞诗内容的复杂性、多面性，则企图从地域上给以明确的规定，以为边塞诗就是诗人身历边塞创作的诗篇，甚至把“边塞”之地域限定于沿长城一线的西北边疆，于是又引起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与纠葛。这些意见之不够完全、不够合理，就在于执一而论，企图简单化地解决问题。

在我们看来，边塞诗不等于战争诗，不等于爱国诗，民族诗，不等于写在边塞的诗；也不简单等于上述诸种内容诗篇杂凑一块的混合体；上述诸方面诚然可以是构成边塞诗的内容要素，而作为边塞诗则已具有系统的整体性质了。

边塞诗不等于写边疆战争的诗，“写战争”三个字不足以概括边塞诗的丰富内容，是极其显然的。唐代边塞诗中，有相当数量描写边地山川胜迹、人文风俗的作品，它们无法归入战争诗之中，当时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唐帝国与边疆少数民族或四邻国家间友好交往、商旅往来，尽管常常与边塞或战或和的形势息息相关，但是直接反映这种和平交往之作，显然也难以归入战争诗之列。由边疆战争和民族问题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如抒发从军报国之志、赴边送别之情，议论朝廷边策之得失，总结战守的历史经验，以至单纯表现边地环境之凄苦、怨久戍、思故园、念征人等情绪的诗篇，严格讲也难以说是写战争的。明显的，如常建的《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及许多写唐使入蕃、唐公主和亲的作品，表达的是民族和好的愿望，张籍的《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描写丝路古道上商旅往来的情景，王维的《凉州赛神》、高适的《营州歌》、崔颢的《雁门胡人歌》、马戴的《射雕骑》写塞上风尚民俗；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储光羲《关山月（一雁过连营）》、戴叔伦《边城曲》只是一般写景抒情。不明显的，如众多的“征人怨”、“征

妇怨”，揭露军中矛盾，帝王寡恩，功高不赏，将帅不恤士卒，伤边土沦丧，边民苦难的作品，究其事虽由边战引起，而作意则不在于写战争，似亦难以归入战争诗之列。仅以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岑参的诗作看，《戏问花门酒家翁》《赵将军歌》等写的是各族的友好相处；《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敦煌太守后庭歌》《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写的是边地音乐舞蹈和将帅欢娱生活情景；《白雪歌》《热海行》《火山云歌》《天山雪歌》等描写了边地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和送别情谊；《题金城临河驿楼》《登凉州尹台寺》《题铁门关楼》等写了塞上名胜、古迹、天险；他还有更多的诗描写了塞上异于内地的气候环境，高山大漠，古道城戍，奇花异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等等，或实录其所见所闻，或借以言志抒怀，或用以呈献应酬，既无片言只语涉及战事，自然难以说是战争诗，但如果将它们排斥于边塞诗之外，恐难得到学界首肯。事实上岑参边塞诗中直接描写战争的仅占极少数，而更大数量则写及边塞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具有更深广的意义和价值。岑参诗是如此，整个唐代其他诗人所作的边塞诗也是如此。把边塞诗只看成写战争的诗，或仅从战争问题讨论边塞诗之成就得失，易于导致对边塞诗的否定，近年讨论中，吴学恒、王绶青等同志的文章，其失由此而起。

边塞诗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看来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不一致的方面。边塞诗与边疆战争、唐代民族矛盾息息相关；在叙写这方面内容时，多数作者站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唐帝国的立场，也是事实；这样的诗，其基调既是爱国主义的，也是民族主义的，笼统这样说似无不可。但这里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1. 唐代边塞诗中，仅从对待边疆战争、民族斗争的态度看，诗人们的认识、观点是很不相同的，有赞成、有反对，有歌颂、有诅咒，牵涉到具体战争事件，情况又更加复杂，仅从爱国

主义、民族主义评其得失，是很难纠缠清楚的。

比如对“中”“外”关系、和战问题：

勿使燕然上

惟留汉将功

陈子昂《送魏大从军》

愿将腰下剑

直为斩楼兰

李白《塞下曲》

汉家旌帜满阴山

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

何需生入玉门关

戴叔伦《塞下曲》

忘身辞凤阙

报国取龙庭

王维《送赵都督……》

要须洒扫龙沙净

归谒明光一报恩

武元衡《出塞作》

更欲奏屯田

不必勒燕然

古人薄军旅

千载谨边关

王勃《陇西行》

闻道玉门犹被遮

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

空见蒲桃入汉家

李颀《古从军行》

近传天子尊武臣

强兵直欲静胡尘

安边自合有长策

何必流离中国人

张谓《代北州老翁答》

功成画麟阁

独有霍嫖姚

李白《塞下曲》

纵饶夺得林胡塞

磧地桑麻种不生

陈陶《陇西行》

当令外国惧

不敢覓和亲

王维《送刘司直……》

和戎先罢战

知胜霍嫖姚

皇甫曾《送和西蕃使》

天涯静处无征战

兵气销为日月光

常建《塞下曲》

绝然相反两种态度，能否简单地论定其孰是孰非呢？能否以今天标准评判其何者符合于爱国主义？或何者为狭隘民族情绪呢？

就某一具体战争看，诗人们常常也有绝然不同的评价：

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论者多以为是歌颂镇守青海将士报国壮志的，对青海战争自然是取肯定态度。然而杜甫《兵车行》却说：“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予以批判、否定。有人据此批评杜甫迂腐，不懂国家民族的大局，虽然没说不爱国，显然已经与爱国主义格格不入了。又如《哥舒歌》这首陇右民歌，歌颂哥舒翰奋战青海陇右的赫赫战功，给以“反映民众情绪，表现爱国精神”的评价或许问题不太大；然而李白却诅咒哥舒翰，“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诚然《答王十二

寒夜独酌有怀》不是边塞诗)；他对战争的态度是否有悖于爱国主义、民族感情？人们当然不会这样来责难李白，也难以同意上述对杜甫的责难。这就可见，在对待边塞战争、民族矛盾一类复杂问题上，不宜简单地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划线，作出得失的评价，而有更加复杂的情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我们以为，从总体上看，唐代边塞诗中，既有相当数量表现爱国忠君、保土卫边、誓扫“胡虏”的豪情激越的歌唱，但如上文所说，更有主张民族和好、谴责骄主悍将、穷兵黩武的反战诗篇。在后一方面，其内容之广，数量之多，更远远超过前者。如揭露战争加给中外人民的苦难，造成生产的破坏；揭示朝廷将帅的腐败和封建军队中多方面的矛盾；描写久戍不归的怨望，抒发征夫思妇伤离念远的愁绪，以及基于上述种种而产生的对战争的诅咒等等，都是无法直接归入表现民族精神或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之范畴的。因此，把对边塞诗的评论集中在是否表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上，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实际。

2. 国家、民族的概念是个历史的范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有它的具体历史内容。我国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的一般表现是忠于君国，而这个“国”，则往往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这种爱国与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大家庭和基于此而产生的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大有区别，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今天笼统用爱国诗来范围唐代的边塞诗，看来不够科学，把边塞诗的美学价值局限于今天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更其不全面。至于说民族主义或民族精神，就尤其要做具体分析。

尽管边塞诗中，往往以“汉”、“胡”或“汉”、“蕃”、“戎夷”一类词语概言唐王朝与其境外民族国家或边疆少数民族，然而这个“汉”又很难简单理解为“汉族”。唐王朝这个中国封建时代开放的朝代，在王朝政策上本来较少民族歧视与民族偏见，在京畿、内地大量安置四境归附的少数民族，大量任用少

数民族将领便是明证。正因如此，许多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倾心归附，为唐帝国尽忠尽力。天宝年间，“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资治通鉴》卷216），如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王思礼等著名将领，便都属于少数民族。他们镇守边疆，屡建战功，唐帝国在四境的赫赫声威，与他们的贡献密不可分。因此，我们说唐帝国的边功，是当时国内各族将士共同创立的；各族将士在边塞战争中表现了英勇献身精神，与其说是汉民族精神的发扬，不如说是中国历史上特定时期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的体现。如此看来，则唐帝国与突厥、吐蕃或高丽、南诏等所进行的边塞战争，既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又不单纯是汉族与某一少数民族间的矛盾，把它看作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族共有的唐帝国与当时建立在唐朝四境的这些少数民族国家间“国”与“国”矛盾斗争的产物，似乎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利于科学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和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

“胡”、“蕃”、“戎夷”等语的涵义就更其广泛而不确定，既可以指国内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又常常泛指唐以外的其他国家民族。然而就边疆战争这个角度来说，无疑，多数情况下是指与唐抗衡的敌国，间或也指在边疆发动叛乱的少数民族。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对边塞诗中“胡”、“蕃”、“戎”、“夷”等缺乏明确规定性的涵义的词语，与其作为“少数民族”来理解它，毋宁说它们是唐帝国四境诸民族国家（而主要又是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的行国）的代称更为恰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于岑参在呈献高仙芝的作品中大骂“戎夷知丧亡”，高适贺哥舒翰的诗篇中说出“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转旆胡星坠”的话，而竟然不怕犯忌讳，就不可理解了。不可讳言，古代诗人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有很大局限，加之历史问题的错综复杂，边塞诗中这条界限是不清楚的，但今天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实际，力求加以科学的分析说明，对于正确理解边塞诗的内容、价值，加强

民族团结，不无好处。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不宜过分强调唐代边塞诗的民族精神，不论是褒是贬，把边塞诗的主要内容看成是写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民族斗争，是不科学的。

能否以创作地点判定作品之是否属于“边塞”呢？首先，文学史的实际告诉我们，在唐代边塞诗创作繁荣的时代，许多没有从军出塞经历的诗人，纷纷从事边塞诗创作；许多写了边塞诗的诗人，无法考定其出塞经历与行踪，包括王昌龄这样著名的边塞诗人，研究者至今也无法确认其究竟于何时出塞，行经何地。这样，对大量脍炙人口的边塞诗，谁能断定它一定是写于塞上呢？有的同志据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写到碎叶、玉门关，便断定他到过这些地方，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次，从六朝叙写边塞战争的乐府诗到唐代边塞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诗中往往排比汉唐边塞著名的地名敷衍成篇；可知它是诗家惯用的手法，多属泛咏，而非纪实，更不必是诗人亲历其地。卢照邻《战城南》有“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的描写，谁要据以考证仗在哪里打，岂不闹出笑话？唐太宗的《饮马长城窟行》，从交河阴山写到玉塞龙堆，他本人却清清楚楚没有到过这些地方。骆宾王的《从军中行路难》“玉关尘色暗边庭，铜钺杂虏寇长城……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龙鳞水上开鱼贯，马首山前振雕翼”，更是这种排比地名的典型例子。这种现象，自初唐至晚唐，并无不同；可知这类诗中的地名，只有借用以喻指的意义，而不具有作为地理实体的意义了。至于边塞战争对于当时社会的深广影响，可以说渗透到生活的一切领域，故上自帝王卿相，下至普通民众、宫女乐妓、释道之人，都关心边事，都有边塞之作；他们对边塞问题抒写感慨，当然不必身历塞上。由此可见，把边塞诗的理解为写于边塞的，同样不够科学。至于把边塞地域，仅限于西北沿长城一线，其不全面尤为显然。唐与吐

蕃的战争，不能以此为限；唐与南诏的战争，也难以否认是历史上的边疆战争。

为了全面认识唐代边塞诗，我们认为不可把它的范围限得过于狭窄。基于此，我们以为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的，统统都可以归入边塞诗之列。其中既有描写战争生活的豪壮“军歌”，又有大量不直接写战争的抒情诗、咏物诗、山水诗，朋友赠答、夫妇情爱之类的作品；既有表现强烈爱国思想的强音，又有低沉抑郁的对战争灾难的痛苦倾诉，对王朝黩武的义正词严的批判；有壮阔瑰丽的边地风光的图画，也有深沉细腻、或欢愉或悲怨的心弦的弹奏；既有写成于塞上烽火血泊之际的，也不乏产生于内地花前月下的作品。一句话，所谓边塞诗，就是我们对特定的时代（唐代）大量出现的描写与边疆军旅生活相关之人事情景的诗歌所建立的一种整体的、多层次的认识。它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而并不排斥其他时代有性质相类的诗歌，它是边疆战争的产物，却并非以写边战所能局限，它与民族矛盾斗争相联系，却远非民族矛盾所能概括，它反映的是文人从军、将士赴边的生活内容、情感体验，却与全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总体上看，它的内容是同一的、确定的；分析地、局部地看，则又是复杂多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对它只有建立一种综合的认识，才可能对一代边塞生活的背景、内容、影响，给以完整的把握，做出正确的评价。

为什么边塞诗不兴盛于汉代，不成就于元代、清代，而在唐代结出硕果？我们以为既有社会的原因，又有诗歌内在发展方面的原因。概而言之，它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这样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舍唐而

外，中国历史上确乎没有第二个朝代全面具备这种条件，因而必然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边塞诗创作的高潮，产生可与之媲美的作品。历史之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唐代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一枝独秀”的地位，具有不可代替的永久魅力。然而，唐代边塞诗的光辉成就，又是建立在对前代艺术传统、艺术经验的继承发扬之基础上，因此又是一种历史延续性的生动体现。

探究唐代边塞诗繁荣的社会原因，除了人们常谈到的促使唐诗繁荣的一般原因外，尤其应注意唐朝（主要是初盛唐）国力强盛，国威远扬，国土开拓，中外交往密切，边塞战争频繁，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这样一些“特殊”的与边塞诗关系更加直接的方面。正是这些条件，造成当时人们向往边塞，向往军功，尚武精神大发扬和对自己国家、民族充满自豪感、自信心，爱国精神大发扬的局面。这个问题，在边塞诗讨论中，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做过论述，这里只补充说明一点：

上文我们否定了把边塞诗内容局限于写战争、表现爱国思想的说法，现在又说它是尚武精神大发扬、爱国精神大发扬的产物，是否自相矛盾呢？

边塞诗无疑是人们热心从军、关心边塞的产物，而从军报国、抗敌御侮、关心边疆安危无疑是爱国精神的表现。然而，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封建统治者在国家强盛的同时滋生出来的骄奢黷武之心，边军将帅逞欲肆志滥施杀伐的不义之举，封建军队内部不可避免的矛盾腐败现象，长期战争的牺牲、消耗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给士兵带来的痛苦等等，必然引起人们对边疆战争的各个侧面做多层次的思考，边塞诗中复杂而丰富的内容，正是这种深入思考的产物。我们看盛唐时代创作边塞诗的著名诗人，从骆宾王、陈子昂到高适、岑参、李白，以至于一般印象中是忘情物外的王维，无不是向往从军边疆、高歌报国志的豪侠之士。然而在他们的诗中却又无例外都有对战争灾难

的倾诉和谴责，或军中痛苦的低回吟唱，岂不是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吗？

诗人陈子昂，在高歌“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三十五），“当取金人祭，还歌凯入都”（《答韩使同在边》），“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赠将军重出塞》）的同时，也时时发出“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感遇》其三，三十七，三十四）的感喟，谴责执政者对边事的失策，“肉食谋何失，藜藿辄纵横”（《感遇》二十九）。诗人高适向往“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的勋业，吟咏“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登陇》）的壮语走上西塞。“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的诗句，充分表现着他尚武爱国的精神。然而诗人脑中又不乏“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五首》）这样对边事的深忧。《燕歌行》一诗，充分写出他对当时边塞战争中多方面矛盾的认识。岑参诗中这种思想的矛盾就更加显然，有“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为国忘家、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也有“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过酒泉忆杜陵别业》）、“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安西馆中思长安》）的愁思，更有“朝庭轻战功……万里如飘蓬”（《北庭贻宗学士道别》）、“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日没贺延碛人》）的怨望。尤其随着盛唐时代的过去，到中晚唐，面对着满目疮痍、国势日蹙的现实，更多的人在冷静反思，总结盛唐的历史经验，这后一方面的内容更大量增加，从而形成中晚唐边塞诗与初盛唐各不相同的特色。

由此可见，边塞诗中这充满矛盾的思想内容，人们对边塞战争成败利弊等等问题所进行的多侧面多层次地思考，无不是人们关心、向往边塞，倾心尚武报国的风尚的产物；而那些描写战争灾难的暴露性的或反战的诗篇，那些志士失意的痛苦吟唱，则是卫边杀敌、报国建功的强音的不可或缺的和弦；它们共同构成了时代思潮、社会心理更具广度和深度的立体的图画。

注意边塞诗创作的“史”的联系，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流变上对唐代边塞诗的繁荣做出恰切的说明，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的又一方面。考察唐以前诗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边塞诗正是古典诗歌中早已存在的写战争诗歌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先秦时代，诚然是没有“边塞诗”的。因为从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所谓“边塞”问题，出现于秦汉中国成为统一国家之后，民族矛盾斗争的问题，也只是在汉民族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秦汉时代始，才占据了中国历史的重要一角。先秦时代，我国境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尚处在形成时期，当时被称为戎狄的部族，与华夏各族之间，虽不断发生过战争，但也不断趋于融合，终于共同形成了汉民族。因此，当时的这种战争，不能与后代中央王朝所进行的边疆战争相提并论；当时这种部族间的斗争，也不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看待；《诗经》中写秦讨西戎或周伐玁狁等战争的诗篇，自然不能算是边塞诗。然而这些诗作为我国战争诗歌的源头，对于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又是不可忽视的。如《秦风·小戎》既盛赞王师车马、兵器精良，又抒发妻子思念久戍丈夫的矛盾心情，对于唐代边塞诗写征夫思妇离情别恨一类作品，不能说没有启迪。《小雅·出车》，从战争形势的严重，备战心理的紧张，写到出师场面、怀归的心理，以至凯旋祝捷和家人团聚的欢乐，叙写了这样复杂的内容，对于唐代边塞诗中的长篇叙事之作的影 响，似亦可以找出蛛丝马迹。

“出车彭彭，旂旐央央”与“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

间”（高适《燕歌行》），其军行的声势场面多么相似；“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岂不就是“奉诏受边服，总徒筑朔方”（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这些个别的例子，尽可以启发我们去研究思考。

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但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而没有给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歌辞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也是可以看出其间的影响承继关系的。尤其只有四句十二字的质木无文的《古胡无人行》，被李白铺写成形象气韵丰满的长篇，又被贯休一反其意写成反黠武、歌德化、具有崭新思想意义的篇章，则这种继承与发展关系，可以看得更清楚。

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这种影响，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建安至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势，从曹氏三祖、建安七子、蔡琰起，直至梁陈，用乐府旧题歌咏从军边疆，描写塞上苦寒，抒发征夫思妇离情的作品愈来愈多，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其中有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即第一，这类作品愈到后代愈多；第二，没有边塞问题也无从军出塞生活体验的南朝诗人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第三，这些作品差不多都是借用汉代用兵西北边疆的故实，相互唱和，模拟仿作，泛泛歌咏，而很少是实写当代边塞生活体验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写边塞战争生活的诗歌传统正在形成。对于南朝文人们说来，或者这更多的只是表现为一种创作“习

惯”，但这“习惯”之得以形成，无疑是一种历史意识的产物，是两汉经营西北边疆和对外战争胜利造就大一统局面的光荣，与建安至南北朝四百年大分裂大动乱痛苦现实两相撞击给中国人造成的一种心理积淀。人们向往着恢复两汉的“秩序”，尤其对于由北方南迁的人们说来，他们并未意识到中国历史正在经历着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只是一心期望着驱逐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收复“已失去的”半壁河山，歌咏汉代边战胜利的诗篇便是这种心理的折光。到隋唐统一的时代国力极盛，边功卓著，这种历史意识、社会心理，终于得到真正的大发扬，边塞诗也在南北朝诗人们努力创作的基础上繁荣、成熟起来，无论数量之众多，内容之广阔，体会之真切生动，均非前代所可比拟。仅从数量说，《乐府诗集》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收隋以前涉及边塞生活内容的诗篇，据我们粗略统计，共有一百八十多首，而有唐一代边塞诗从对《全唐诗》及其《外编》的不完全统计（按上述我们对边塞诗的理解），则近两千首。这近两千首，是在前代一百八十多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是对前人学习继承、发展创新的结果。

2. 诗歌主题的继承。这一时期边塞题材诗歌的多种主题，诸如描写“胡”地生活情景，大漠草原风光，塞外酷热奇寒的景象，从军报国的壮志，军中苦乐的体验，征人思妇的离愁等等，无不在唐代边塞诗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我们只从不同层次上略举数例加以说明，《乐府诗集》所收《陇头水》一题，六朝人所作九人十二篇，其基本主题有二，一是从军去乡之思，如梁元帝、陈后主、徐陵、张正见等所作，一是报君恩赴国难的气节，如刘孝威、顾野王等所作。唐人之作七人八篇，思想艺术均有一定发展，但基本主题与六朝人相同，可见其承继关系。《乐府诗集》所收题为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与刘商同题之作，鲍照和李白的两篇《代出自蓟北门行》继承关系也极其明显。刘